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

郁建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DOI:10.14167/j.zjss.2015.01.007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 2.0 版。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也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社会科学家的期待正越来越高。而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的成就与经验,也产生了诸多因发展失衡而不断累积的问

题和教训,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对象和领域生动而多彩,重要而紧迫。20世纪50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这种政策大多不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直接结果,而是简单的模仿和追随,造成当时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生产状况不匹配,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现在,社会科学知识引领制度创新的作用愈加明显。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发展社会科学具有巨大的发展需求和空间。

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家是否做好了准备?社会科学家如何参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呢?2004年12月2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要做到“真”“情”“实”“意”即立场、态度、方法和导向的统一,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充满激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树立精品意识。这些要求于今仍然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限于认识深度和篇幅,我下面谈论的体会是很粗浅的。

首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应具有求真务实的态度。

一门社会科学要成为社会科学,必须在科学准则与社会需求之间实现平衡。一方面,社会科学要遵循科学准则,保证获得认知的过程可靠、合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藉由社会科学而对现实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上述两方面要求与求真务实的内涵相符合。求真务实是指我们应积极探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科学审慎的态度研究国家与社会运行的机理,并结合社会需求,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国家与社会建设之中。

“求真”要求我们秉持客观的态度审视事实,在阐述观点时提出切实的事实依据,力图严谨细致地观察世界,防止以观点建构结论,特别是以“外在”的观点构建结论。准确理解中国是改变中国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了解真实中国,解释真实中国,才可能改变真实中国。

“务实”要求我们基于充分调研和大量经验事实做出研判,着力解决与民众密切相关、关系国计民生长久发展的问题。当前的科学研究方式已经从以默顿(Robert Merton)规范为标志的“学院科学”转向了以齐曼(John Ziman)主义为标志的

“后学院科学”,它并没有抛弃科学的根本精神和气质,只是具有了技术化和利益化的背景,使研究更加趋向现实价值。^①在此背景下,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效用价值不仅符合现代科学组织生产方式的趋势,也适应了社会需求的潮流,使“书斋”里的学问走向社会。

可以看到,无论是专注抽象理论问题的基础研究,还是以行为为导向的应用研究,都应做到求真务实,在充分了解现实、准确解释机理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态度的转变需要以科学的方法为后盾和支持。在此,我们提倡“以问题为导向”、“以比较为基本方法”、“以理论创新为追求”的基本原则。

“以问题为导向”,强调淡化学科边界、强化学术分工,避免“唯学科化”的倾向。^②在这里,沃勒斯坦提倡的一体化科学方法值得借鉴。沃勒斯坦致力于建构整体性的历史社会科学,尽管不同路径的价值取向、观察层次各不相同,但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观察层次互相补充,可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问题。如果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考察方式全都遵循单一学科的逻辑,我们的研究就可能产生偏误,难以以不同视角考察研究对象的多个向度,得出科学结论。实际上,我们不仅要突破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藩篱,也要观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破解“斯诺命题”^③,支持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多学科”的提法或许更强调多个学科知识的叠加,而“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提法则更加注重各个学科知识的整合,不同学科在交流和讨论中不断互侵边界,从而拓宽我们的视野。

“以比较为基本方法”,强调从历史中理解现实,从世界中理解中国。时间尽管具有一维性,但若围绕我们关心的问题,把时间看作带有目的地朝某方向运动的箭矢,时间的意义便会由此凸显,我们也就更容易地理解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甚至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时间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前瞻性判断。同时,只有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实。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究竟是一种新的模式,还只是旧模式中的一个阶段?不同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不同的判断。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理解中国问题已经从“世界史”阶段走向了“全球史”阶段,通过“比较”的方法认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与不同,可以帮助我们以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视角更加准确地研判中国问题。

“以理论创新为追求”,鼓励我们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和自说自话、固步自封状态,超越简单译介西方理论或介绍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研究走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基于中国故事挖掘并提炼理论意义是一大挑战。中国学者有时会陷入“信息汪洋”而无法自拔。我们需要超越碎片化信息,形成对学科理论的贡献。研究设计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我们强调的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不是直接接受和认同西方的经验和理论,而是考察这些理论和命题是否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考察其作用条件及适用性。这种不断的反思和再发现,可以推动我们对社会的认知不断完善,甚至使已有范式面临反常和危机,推动学科知识革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避免陷入“为了否定范式而否定范式”或者“为了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执念。无法证伪的命题不是论点,而是观点;对历史细节的描述不是分析,只是对事件的介绍;既强调复杂性又强调偶然性的说明不是严肃的因果解释。在这里,我们应避免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不顾现实而空想出来的理论,另一个则是满足于搜集未实现理论构建的碎片化信息。

库恩曾说“一个科学共同体是解决它的范式所规定的问题或谜题极为有效的工具。”^④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中,科学家共同体的力量不容小觑,它也是当代最有效的科学生产组织形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恰如“盲人摸象”,在探索的过程中,有人摸到“象鼻”,有人摸到“象腿”,有人摸到“象尾”,有人摸到象身体的一部分即将其作为象的整体,但总体而言,如果能摒弃共同体成员“知识的僭妄”,那么这些尝试和努力都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象”的整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真实中国,解释真实中国,并力所能及地改变真实中国。

最后,以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为取向。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它是西方世界兴起的产物。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来,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

中国需要借助西方的社会科学来注释自己和解读世界,但西方社会科学也昭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存在着可能性。西方社会科学的移植虽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这一移植就没有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更谈不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了。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坎坷,尽管它缺乏自主性,但它已经形成,这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存在是超越的前提,超越中国社会科学的依附性,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必然包含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内容。但正如叶启政指出,中国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⑤当前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必须承认西方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然后从中国经验的视角来修正它的局限性,而非通过规避它来面对中国现象。社会科学之为社会科学,必须以普遍性为前提,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必须能够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它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同时,由于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大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社会科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世界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过程中,需要反对两种极端的诱惑:普遍主义的诱惑和特殊主义的诱惑。普遍主义诱惑是将西方的特定历史语境无限放大,这种语境下产生的社会科学也被视为无限适用性,以一种同质性的方式去解释一个异质性的世界,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的和扭曲的;特殊主义诱惑是将每个区域性事物视为独一无二的事物,每一区域性事物完全不同于另一区域性事物,对不同区域性事物的概括和比较都是不可能的,这否定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和非西方国

家建立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抵制这两种诱惑,使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相互渗透,并使之制度化,这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过程中,树立自信开放心态十分重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科学家比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拥有更多的实地调研机会和更丰富详尽的信息材料,却常常囿于方法和心态上的障碍,较少进行理论创新。方法上的障碍可通过学习新知和交流讨论来超越,而心态上的障碍只能通过观念转变予以克服。只有摒弃本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或“学徒状态”^⑥,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思维框架,基于中国经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建设有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由此,中国社会科学家应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值得昂扬斗志、倾情投入的大时代。马林

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写道,这项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国民所做的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科学家满怀热情地在这片广袤土地上耕耘出来的研究成果必将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注释:

①林慧岳、孙广华《后学院科学时代:知识活动的实现方式及规范体系》,《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3期。

②郁建兴《淡化学科边界,强化学术分工》,《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③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④[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⑤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3-4期。

⑥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